

赵颖 著

创造与伦理

罗蒂公共“团结”思想观照下
的文学翻译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赵颖 著

创造与伦理

罗蒂公共“团结”思想观照下
的文学翻译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创造与伦理——罗蒂公共“团结”思想观照下的文学翻译研究 / 赵颖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7

ISBN 978-7-5004-8782-1

I. ①创… II. ①赵… III. ①文学—翻译—②伦理学—研究 IV. ①I046②B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0586 号

责任编辑 史慕鸿

责任校对 李 莉

封面设计 王 华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7.375

插 页 2

字 数 176 千字

定 价 2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1)
一 研究背景与意义	(2)
二 研究现状及分析	(10)
三 研究依据及对象	(25)
四 研究思路与内容简介	(31)
第一章 想象、翻译与“团结”	(36)
一 想象的“沉沦”与“复兴”	(36)
(一) 想象的定义	(36)
(二) 想象的历史回顾	(38)
(三) “后形而上学”语境下的想象	(50)
二 罗蒂的公共“团结”	(54)
(一) 罗蒂和他的新实用主义哲学	(54)
(二) 罗蒂的公共“团结”	(61)
三 创造“团结”的想象与翻译	(67)
(一) 想象是一种“再描述”的官能	(67)
(二) 翻译是一种“再描述”	(70)
小结	(74)
第二章 想象的“飞离在场”实现	
翻译的“设身处地”	(76)
一 “在场”与翻译的“化异为我”	(77)

(三) “意象”的作用	(178)
二 “意象再造”	(180)
(一) “意象”复制的不可实现	(181)
(二) “通而不同”的“意象再造”	(185)
(三) “再造意象”的“通而不同”	(191)
(四) “意象再造”的意义——文学 翻译的“团结”	(204)
小结	(207)
结语	(209)
参考文献	(217)

绪 论

文学，一般认为是想象^①的创造物，但翻译，甚至是文学翻译本身却往往被视为“循规蹈矩”的产物。因而，从想象入手来研究文学翻译，研究想象在文学翻译中的作用的翻译思想家并不多见。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倾向于以理性^②为终极的运思模式，以挖掘文本中“不变的”意义为己任，对文学本身所特有的“反逻各斯”倾向未能给予应有的关注。如此一来，文学翻译就可能会在逻辑单一化思想的掌控下，成为理

① 在中文中，常用想象力来表示作为一种能力或官能（faculty）的想象。在英文中，imagination既可以指想象也可以指想象力。本书在指涉官能时把它称为想象力；指涉过程或不特指官能时，则把它称为想象。

② 理性，就其最基本的意义而言，指的是人类进行逻辑推理的能力。在笛卡尔的主体性哲学中，理性表现为抽象的主体。康德认为，理性是借助全面性的原则把知性所提供的概念综合为一个统一体的力量。虽然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才成为哲学中的核心概念，但这种从意见到真理、从表象到本质的认知方式，却自柏拉图以来，就备受信赖与推崇。可以说，虽然理性作为概念在柏拉图时代并不存在，但对这种认知方式的推崇却是古已有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蒂将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传统哲学都看作这种认识论中心主义的产物——渴望追求“不变的始源”。而我们，也正是基于此，才忽视理性在概念名称上的变化，直接指出，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传统哲学，都在理性至上观念的掌控之下。详见汪民安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84—186页；Richard Rorty, “Introduction: Antirepresentationalism, Ethnocentrism, and Liberalism”, *Objectivity, Relativism and Tru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21。

性“化异为我”的工具。文学（作品）自然也会成为被压制和漠视的“他者”^①。

随着思想观念的日趋多元，人们逐渐认识到，想象不仅可以摆脱理性附庸的地位，而且能够在理性思维停止的地方“自由飞翔”^②。在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 1931—2006）看来，它更是可以成为实现公共正义、创造人类“团结”的力量。从这个角度来说，将想象引入文学翻译的研究，便有可能保有文学本身所特有的“反逻各斯”倾向，实现“自我”^③与“他者”的和谐共存，达成文学翻译的“团结”。

一 研究背景与意义

虽然在哲学领域，伴随着对“逻各斯中心主义”^④的批

① “他者”是与“自我”相对的概念，其内涵非常复杂。在本书中，当“自我”作为理性代言人的身份出现时，“自我”指代大写的“I”。它是抽象的主体、非个体的人和自足的施动者。与之相对，“他者”则成为“自我”压制掌控的对象和客体，不具有独立的个体身份。而在“他者”摆脱“物化”身份的语境下，“他者”便和“自我”一样都指涉作为独立个体的人或自有其独特性的生命个体。她们/他们/它们是平等关系。

② 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是想象受理性束缚，还是想象可以摆脱理性的束缚，事实上都是指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变化，并不是想象或理性自身发生了改变。换言之，说想象可以如何如何，只是人们认为想象可以如何如何的简略说法，是为了使行文简洁而已。

③ 参见对“他者”的界定。

④ 逻各斯中心主义指的是一种思想形式。这种思想形式立足于某个外在的参照点上，把人的认识、理论等看作某种外在的自在之物、绝对真理或上帝的意志等绝对东西的表现。它以一种语言学的假设为前提，即语言是从属于语言以外的某种观念、意图或所指。这样，语言本身便只是观念的媒介，是思想的表达式。在德里达看来，从古希腊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以来的整个西方思想一直被逻各斯中心主义统治着。构成西方哲学的种种概念对立也都是这种思想形式的结果。详见汪民安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第189—194页。

判,哲学的文学化、“诗化”倾向越来越明显,但是,翻译研究,或更准确地说文学翻译研究,却至今还没有完全走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泥淖。

首先,有必要简单追溯一下与本研究关系密切的哲学的文学化、“诗化”历程。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约公元前427—前347)推崇“理式”和“共相”,以哲学家为他所构建的理想国的国王,但他却把诗人逐出了理想国。哲学与诗泾渭分明,地位迥异。哲学占据绝对的支配地位。随着时代的更迭,哲学高高在上的统治地位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当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喊出“上帝死了”^①的时候,对永恒“在场”^②的渴望,已经开始为对自由、对“自我”创造的渴望所取代。尼采把真理视为“隐喻的机动部队”^③,视为“自我”创造的产物。哲学与诗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合流之势。及至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时期,“一切思着的思都是诗的活动,而一切作诗则都是一种思”^④,诗与思开始趋向“诗意”的相聚,哲学趋于“诗化”。哲学“诗化”的努力,同样得到了解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快乐的科学》,黄明嘉译,漓江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页。

② 有关“在场”的解释,可参见本书第二章。

③ 1873年,在《在一种非道德的意味上探讨真理和谎言》(On Truth and Lies in a Non-moral Sense)(当时这篇文章并没有发表)一文中,尼采提出了这个观点。研究者认为,尼采的这一思想是他整个哲学思想的核心,表明了他对普遍性的抛弃。参见 Robert Wicks, “Friederich Nietzsc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15 July 2008, Stanford University, 20 Dec. 2008. <Http://plato. Stanford. edu/entries/Nietzsche>。

④ 马丁·海德格尔:《通向语言之途》,转引自周国平编著《诗人哲学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0页。

构主义^①的代表人物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1930—2004) 的响应。他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 对修辞和语言游戏的认可与推崇, 都表达出他试图把哲学非哲学化的努力。作为行走在修辞与逻辑之间的哲学家^②, 可以说, 德里达的哲学就是一种“诗化”哲学。

从尼采一路走来, 我们可以看到, 哲学正在一步步走出对“不变始源”的片面执著, 转而开始关注修辞与诗。从这个角度来说, 哲学已经趋向文学化、“诗化”。哲学的文学化倾向, 在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罗蒂那里, 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把哲学看作一种“文学批评” (literary criticism)^③。在他这里, 哲学似乎已经完全非形而上学化、非认知化了。在这样的语境

① 解构主义 (Deconstruction) 是当代西方一种运用解构策略和非中心化观点来研究哲学、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文化思潮。它是西方从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的重要转折点, 其代表人物为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与结构主义片面强调结构、中心和二元对立, 而无视中心的相对性和语言的差异性不同, 解构主义否认真理的绝对性、结构的稳定性以及能指与所指的统一性。它的两个基本特征是开放性和无终止性; 它所采用的主要批判策略包括: 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延异、增补以及互文性。这些特征和策略都表现了强烈的反理性主义倾向。解构主义批评虽由德里达提出, 但主要流行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美国, 并形成了以保尔·德曼 (Paul de Man)、希利斯·米勒 (J. Hills Miller)、吉奥弗雷·哈特曼 (Geoffrey Hartman) 和哈洛尔德·布鲁姆 (Harold Bloom) 四位为中心的“耶鲁学派”。详见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259—268 页。

② 有关德里达对修辞与逻辑的看法, 可参见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访谈序言》, 张宁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年版, 第 13 页。在这次访谈中, 当被问到“思考哲学, 应当以逻辑的方式还是以修辞的方式进行”时, 德里达答道: “在是与不是之间。”

③ 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 徐文瑞译, 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 第 112—113 页。引者注: 对罗蒂著述的引用, 在该著述已有汉语译本时, 多会选用现有的汉语译本的译文, 当认为汉译本的译文与自己的理解有出入时, 则在参照汉译本的同时, 依照自己的理解重新翻译, 特此说明。

下,对“他者”的伦理就不再是把特殊置于普遍的原则之下,而成为时间和机缘的产物。换言之,对“他者”的关注,不应该再立足于一个不变的中心,而要指靠整体的观照和“设身处地”的认同。

遗憾的是,以期许与“他者”相沟通为己任的翻译,人们对它的认识,却依然徘徊于对“原本”的追求和对不变意义的挖掘之间。当然,伴随着解构主义的兴起,在翻译研究领域确实也在开展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研究^①、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研究^②以及解构主义翻译

①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研究,是指用后殖民主义的视角来透视翻译现象和建构翻译理论的一种活动。一般认为,翻译领域的后殖民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它视翻译为殖民文化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及文化帝国主义思想观念对外进行霸权扩张的工具,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在权力差异语境中展开不平等对话的产物。它主要关注的问题是,译本生成的外部制约条件以及译本生成后对目标文化的颠覆作用。在后殖民主义研究的语境下,翻译所起的作用主要有以下三种:(1)殖民化的途径;(2)解殖民化的工具;(3)对文化不平等加以掩饰。可参见方梦之主编《译学辞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Edwin Gentzler,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revised second edi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pp. 150—162。

②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它的研究目的是,颠覆将女性纳入社会底层和将翻译纳入文学附庸的哲学传统。女性主义者认为,语言不仅反映了性别歧视的现实,而且强化了性别歧视,因而,翻译便不会是一种机械的语言转换,而应该是一种涉及文化干涉和协调的创造性活动。女性主义者对翻译理论的许多基本问题都有自己的阐释,概括起来大致是:(1)翻译哲学:突破(传统翻译理论的)二元对立思维;(2)翻译标准:符合女性主义的要求;(3)翻译目的:延展女性话语权;(4)翻译策略:尽量让女性在语言中显现;(5)翻译方法:以女性主义的方式改写原文;(6)译者的地位:与作者平等;(7)译文与原文的关系:平等互补等。参见方梦之主编《译学辞典》,第48—49页;Luise von Flotow, *Translation and Gender: Translating in the “Era of Feminis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理论研究^①，都可称为这种关注的产物。但这些研究大都属于一种文化或哲学层面的外部研究，对翻译本身的问题并没有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探讨。

在《翻译研究的多重转向——新范式抑或视角转换？》一书中，斯内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 1940—）提出，在新千年的前五年中，翻译研究又回到了语言学时代——语言学研究方法重新振兴。等值、原型语义学（prototype semantics）以及翻译普遍性等话题，又成为翻译研究的热门话题。她把这种复兴称为翻译研究的U字转折，认为它并不代表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的出现；相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倒退。^② 如果从哲学的文学化、“诗化”倾向来看，这种转向本质上是由于没有突破“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束缚所致。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对语言层面的关注，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对翻译本身的关注。这种关注，不仅不应该受到质疑和打压；就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言，它还应该成为我们重视的一个焦点。同样的，在哲学“文学化”的大背景下，以“诗化”的眼光来关注文学翻译本身，也不失为一次有益的尝试。

①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研究，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法国，代表人物为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严格来说，解构主义译论并没有提出具体的翻译理论，而是试图借助对翻译的讨论来探究一系列关于语言和哲学的重大问题。这一理论无视原文，认为文本中并没有什么深层结构或预先决定的意义。它拒绝任何类似“原文”与“译文”、“语言”与“意义”的划分，指出：在翻译中，可以看到语言并不指向任何外在的事物，因而，原文和译文之间存在的符号指意链便是一条可以无穷向前追溯的链子。可参见方梦之主编《译学辞典》，第38—39页。

② Mary Snell-Hornby, *The Tur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New Paradigms or Shifting Viewpoint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pp. 149—164.

本书便是从批判文学翻译中存在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倾向入手，来对文学翻译中想象的作用加以研究的。

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传统哲学，试图逃脱时间和机缘的掌控，追求“不变的始源”和“绝对的中心”，正确的认识因而就成了与对象的本质或实在符合一致。这种“镜式”^①哲学，在翻译中表现为相信原文有不变的意义，而翻译就是要“忠实”再现原文的意义。自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前43）的意译、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圣经》翻译的通俗化、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1747—1814）的“翻译三原则”，一直到现代奈达（Eugene Nida，1914— ）的功能对等，等等，在根本上都一直受制于这种认识论中心主义的思想。这种认识论中心主义以理性为基本的运思方式，把文学作品视为对象性的客体，试图通过分析和抽象对文本的意义加以剥离、复制。但是，理性的还原（reduction）和概念化却可能会抽干文学“意象”的生命灵韵，使其蜕变为僵化、呆滞的观念重复和思想停滞，进而使文学翻译丧失其应有的艺术品格。而这正是与文学翻译所应有的对生命力的关注及其对人性的聚焦大相径庭的。

① 罗蒂认为，传统哲学是一种“镜式”哲学。它主要关注有关再现表象的一般理论，试图为人类找出一种永恒的秩序，一种长存的有关人类思想的中性框架。他指出，自柏拉图时期就有了“镜式”哲学的雏形，但真正意义上的“镜式”哲学起始于17世纪的笛卡尔。及至后来洛克和康德所提出的哲学观念，以及20世纪的分析哲学也都可以归入“镜式”哲学。不过，笛卡尔、洛克和康德探讨的是映现世界的心灵之镜，分析哲学则主要关注映现世界的语言之镜。罗蒂放弃了这种“镜式”哲学，提倡“无镜”哲学。在他看来，认识活动不是和客观实在相符合的镜像式的反映过程或符合过程，也不是主体发现客观实在的发现过程，而是一个创造的过程。详见 Richard Rorty,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高尔基 (Maxim Gorki, 1868—1936) 把文学称为“人学”。^① 在此意义上, 一切事物一旦进入文学的艺术世界, 便具有了“人”的意味和特性, 也就因此获取了生命, 与“人”成为“同类”。这意味着, 文学有其特定的“反逻各斯”倾向, 即不是以逻辑性和系统性为诉求, 而是要“反常识”地把全面、丰富、多元视为追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自柏拉图以来, 西方思想要贬抑“诗”和“艺术”的“模仿”, 认定其中并不含有“真理”及其“表象” (representation, “再现”)。但是, 文学的艺术追求本身毕竟显现出的就是一种非逻辑的建构和创造。在伊格尔顿 (Terry Eagleton, 1943—) 看来, “到了浪漫主义时期, 文学甚至开始与‘富于想象力的’ (imaginative) 成为同义词”^②。从这个角度来说, 文学翻译如果要保有“文学”的头衔, 要保有“人”的生机和活力, 就不能听命于理性的掌控, 任凭理性的单一话语四处横行。因此, 对逻辑单一化取向的批判, 首先是对文学本身的认可, 是对其本质属性的认同, 同时也是对想象的认可。

实际上, 想象, 在“逻各斯中心主义”正遭受全面批判

① 文学即“人学”是高尔基对文学的基本认识。这一思想蕴含在他全部的文学创作思想中。但是, 他并没有用直接引语的形式说出这个看法。据考察, 高尔基直接谈到“人学”有两次。1928年6月12日, 高尔基被选为苏联“地方志学”的成员。在苏联地方志学中央局的庆祝会上致答谢词时, 他把自己主要从事的工作称为“人学”。这是一次。另一次出现在1930年发表的《谈艺录》一文中。尽管并非直接说出这一命题, 不过, 高尔基把文学称为“人学”这一命题却已经得到学界认可。参见《高尔基说过“文学即人学”吗?》, 《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第4期, 第184—185页。(引者注: 这篇文章是评述李辉凡发表于1980年第3期《俄苏文学》上的文章《我国高尔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文章没有署名。)

② 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second editio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 p. 16.

的境遇之下，并不只是在艺术创造领域才能纵横驰骋，而是能够摆脱理性的束缚，使我们有可能在概念思维停止的地方“自由飞翔”。伊格尔顿更是认为，“从我们是浪漫主义的产物的意义上说，我们都是后浪漫主义者”^①。如此说来，身为“后浪漫主义者”的我们，便应该对想象的作用继续给予高度的重视。

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文学翻译家茅盾先生在《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一文中提出，必须把文学翻译工作提高到艺术创造的水平，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好的翻译者一方面阅读外国文字，一方面却以本国的语言进行思索和想象”^②。从这个角度来说，想象在创造性的文学翻译中的作用便应该是必不可少和至关重要的。遗憾的是，在文学翻译研究领域，探讨想象和翻译关系的论著却并不多见。即使那些把文学翻译视为艺术创作的翻译思想家，也很少有人触及这二者的关系这个话题。笔者读书所见，只有杰宁斯（Kelly Jennings）在她的博士论文中直接把翻译视为隐喻（metaphor），视为一种形式的想象。^③与此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翻译，甚至文学翻译本身，一般都会被视为理性思维的产物。

在这样的语境下，以罗蒂所提出的想象创造公共“团结”的思想为依托，探讨文学翻译和想象的关系、文学翻译中想象

① 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second editio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 p. 16.

② 茅盾：《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见罗新璋主编《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13页。

③ Kelly Jennings, “Translation as Metaphor: The Function of Change in Roman Construction of Greek Poetry”, Diss. University of Arkansas, 1995, p. 97.

可能发挥的作用，或许就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第一，有助于揭示文学翻译走出“逻各斯中心主义”束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第二，有助于彰显文学翻译的“反逻各斯”倾向；

第三，有助于明晰如何促成文学翻译的伦理：创造“自我”与“他者”的“团结”；

第四，有助于重新审视想象和文学翻译的关系，从而可以更加准确地把握文学翻译的“诗化”本质。

二 研究现状与分析

虽然把文学翻译视为艺术创造已经不是一件新鲜事了。但是，以文学所特有的“反逻各斯”倾向为关注的焦点，从想象入手来研究文学翻译，研究想象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的作用的文章并不多见。

在国外研究者当中，韦恩（Couze Venn）在《翻译：政治与伦理》^①一文中，简单触及想象在翻译中的作用。在探讨翻译的伦理问题时，韦恩将利科（Paul Ricoeur, 1913—2005）统一“同一性”（identity）和“他异性”（alterity）的三种模式^②引入翻译研究，提出了三种翻译模式。这三种模式都指向尊重“他者”的伦理，渴望与翻译所构建的“他者”展开对

① Couze Venn, “Translation: Politics and Ethics”, in Michael Groden, Martin Kreiswirth, and Imre Szeman, eds., *The Johns Hopkins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 Criticism*,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82—84.

② Paul Ricoeur, “Reflections on a New Ethos for Europe”, trans. Eileen Brennan, in Richard Kearney, ed., *Paul Ricoeur: The Hermeneutics of Action*, London: Sage, 1996, pp. 3—13.

话。具体说来，第一种模式是“语言好客”的模式。这一模式认可多种语言存在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在翻译时，在注重译入语本身独立性的基础上，欢迎其他语言、文化的“来访”并希望与之共存。第二种模式是“交换记忆”的模式。按照这一模式，翻译也就意味着“自我”的过去和“他者”的过去可以通过再描述得到融合。这时，译者应该以想象和同情承担起对“他者”的“故事”的责任。第三种模式是“原谅”的模式。它与第二种模式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在“交换记忆”或通过再描述融合彼此的记忆时，在省察自己的苦难之前，最好能先对别人的苦难加以“想象”。之后，以叙述性的语言，以原谅的态度，展开回忆，把“过去”重新描述出来。如此一来，在想象的认同中，人们就会更容易原谅别人加之于自身的苦难，从而减少双方的痛苦。

从这三种翻译模式可以看出，想象在对“他者”的伦理建构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惜，韦恩只用了一段文字的篇幅对此简单加以评述，并没有展开进一步的分析。

杰宁斯（Kelly Jennings）在她的博士论文（*Translation as Metaphor: The Function of Change in Roman Construction of Greek Poetry*）中提出，可以把翻译视为隐喻，视为“一种形式的想象”^①。在细致分析了罗马诗人在翻译希腊诗歌过程中所做的各种改动之后，她指出，罗马诗人所做的这些改动都有其特定的目的：反映出的是他们所处时代的权力主宰关系，要表达的是自身欲望（desire）以及个人身份的构建。翻译的目的不再仅仅是要表达作者或原文文本的声音，而更是要表达译者自己

^① Kelly Jennings, “Translation as Metaphor: The Function of Change in Roman Construction of Greek Poetry”, Diss. University of Arkansas, 1995, p. 97.